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委员 笔记

## 择一事终一生

苏晋玉

国两会时找到樊锦诗院长,获得她的支持,开启了这部剧的创作之路。

舞台艺术讲究深入浅出,一个艺术创意成为舞台上的精彩剧目,中间要经历的,是潜心创作、不断打磨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困难重重,于《敦煌女儿》而言,就更难了。用江南风格的沪剧艺术表现大西北的故事和文化,挑战不言而喻。更深层地看,怎么塑造好樊锦诗院长独特的人物形象?如何在舞台上展现敦煌石窟瑰宝、讲述敦煌故事,表达莫高精神?

虽然难,但是我充满了创作的热情,因为这个题材太优秀了,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去探索创新、实现艺术突破的宝贵机会。虽然沪剧的表现形式是吴侬软语,但在题材内容和精神气质上一直与时代同步、与城市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女儿》为沪剧打开了一扇窗,说明沪剧完全可以描绘时代气象,也大大提升了沪剧的文化内涵、精神高度和历史的纵深度。

11年,虽然中间也有调整或停顿,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而樊锦诗院长榜样的力量,让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成就了这部作品。《敦煌女儿》成为一条艺术的纽带,把观众和敦煌连接起来——认识主人公樊锦诗,了解敦煌人坚守大漠的故事,感动于莫高精神,体会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多观众说,看了《敦煌女儿》,便对敦煌产生了向往,一定要去一次敦煌。

经常有观众问我,你演的樊锦诗为什么那么像?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用语言表达。我心里满怀对樊锦诗院长和敦煌人的敬仰、对敦煌文化的热爱,走上了创作道路。这些年,我去了敦煌很多次,去看、去感受、去揣摩,人物的穿着打扮、走路的样子、讲话的神态、笑起来的眼神……由表及里,我沉浸在这个角色里,与她融为一体,所以在舞台上,我感觉自己就是樊锦诗。我想,这种感觉也传递给观众了。

当然,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很享受——因为角色不断带来新的挑战,你的脑子不断思考、探索,智慧随之打开,艺术的眼界也随之提升。

如果要给《敦煌女儿》的创作历程找一个主题词,我想是樊锦诗院长勉励我们的四个字——工匠精神。穿越历史烟云,当年莫高窟的工匠千锤百炼,创造出令世界惊叹的艺术瑰宝;几代敦煌人择一事终一生,用爱和生命守护莫高窟,诠释了真正的工匠精神;这些年来,我们不断打磨、精益求精,是在新时代践行工匠精神,用心用情用力走进人民群众、走进火热的生活。

无论是敦煌文化还是沪剧艺术,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传统艺术工作者,我想,要有择一事终一生的决心,用戏曲艺术努力探索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感染更多观众,坚定文化自信。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沪剧院原院长)

## 我和我的纳西族民间故事

白庚胜

## ■ 精彩阅读:

它们曾经是我的百科全书、精神宝库、道德教科书。那里有母亲的爱、故乡的心、民族的根性;让我学会怎样做人、安身、立命;令我久久以人民为师,以生活为本,捍卫人民的文化、文学遗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文化、文学继承人。

我自幼喜欢听或讲纳西族民间故事。因为,那时学校学习单调乏味,自己不仅不识汉语、阅读能力极其有限,而且家里没书可读,村中无书可借。即使在我17岁上任文海附设中学教师时,全校也仅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而民间故事却不一样。我的母亲便是一位讲传高手。我的堂兄白庚生虽是盲人,却也是个故事家。她(他)们是我的至亲,随时在我身边,随地就能为我讲述。我则喜欢把自己听讲后所知道的故事转述给同伴们听,享不尽听众闪闪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情感满足,以及他们称赞我为“故事大王”的快意。感谢这些民间故事,让我懂得了生产生活的各种智慧及人间的真、善、美,并开启了我的想象力,最早培养起我的表达力。

于是,在大学毕业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我主动选定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尽管我喜欢古典文学,也对现代文学、外国文学兴趣浓厚,但那是我之最钟情者。我想,搞民间文学,可以在听故事、看故事书,与故事传承人交朋友中演绎自己的学术人生,岂不快哉?

恰好,那时我们所刚成立,我是第一个研究人员,自然没有导师,也没有科研任务,有的是足够的时间埋头阅读《民间文学》等杂志,海量涉猎国内外民间文学作品,尽一切可能到有关学校、单位去聆听相关讲座,参与一些京城民间文学交流活动,完全沉浸于民间文学的大海,使自己的民间故事乃至民间文学知识一天天增长起来,同时开始将少年时代所知道的一些民间故事翻译整理后寄往《玉龙山》《山茶》等杂志以练笔。

最幸运的是,当时任我所所长的是我国民间文学大家贾芝先生,任党委书记的是老革命王平凡先生。他们根据民间文学存活于民间、古老的民间文学正在消失,以及许多民间文学大家成功的经验及时提示我: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必须兼年富力强的民间去,拜民众为师,向生活学习,既做实地感受体验,又做抢救性收集积累,走好第一步,扣好第一钮。最终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是研究者的田野作业功力。

于是,我于1982年初夏回到故乡丽江,先在大东、鸣音、宝山、奉科,后转移至龙盘长草坡村,继之返回县师训班,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搜集工作;1983年春夏之交,我又赴泸沽湖边采风;到1989年,则在第一次留日归来后前往永春河畔考察;近20年,我常乘欧歌走遍纳西族四大支系分布区作补充调查。记得当初交通条件极差、民间文学生态残破不堪,给开展此项工作带来阻力重重,但我还是主要靠步行、以手电筒代灯、自创文字符号注音、强忍水土不服带来的痼疾等,奔走于纳西山乡,采掘口头文学宝藏,与那些硕果仅存的歌手、故事讲传者、东巴进行最初的民间文学资料积累。其最大的收获是:在上宝山王德义老人处收集到叙事长诗《吕依阿丹若》片段,在奉联和桂花家记录了一组优秀民歌,在拉汝哈巴塔东巴那里听到一首首苍凉的古歌,从龙盘和成典老人口中记录下近40部“大调”作品,在纳西拉哈村投入对火把节及其《唱阿勒》的问俗。由于自己的行动,还引发了所到地点甚至整个纳西族地区的民间文学热,以至于县文化局组织力量对我所采访过的传承人作较为全面的补充调查。这也成为后来纳西族地区的文化保护长盛不衰、三项世界遗产申报成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推广的“丽江模式”的文化、文学奠基。

幸好有了童年的记忆和这几次虎口夺粮式的收集作垫底,也才有了我即将要出版的《纳西传奇》中的百余篇作品及被称作“纳西族最后民歌辉煌”的“大调”系列完整保存至今,且已由我开始翻译整理,得以“长命无灾祸”。

它们对我的整个人生影响至深:我的第一篇论文便是梳理《猎歌》与《吕依阿丹若》关系的成果;我于1983年、1990年先后报考北大、中央民大硕士、博士研究生,正是出于提高田野考察及

理论研究能力的需求;我在21世纪初年出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并一度兼任《民间文学》杂志主编,从2003年起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担任《中国民间故事全书》的主编,一度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全国史诗领导小组工作,组织领导“中国民间文艺三套集成”最后收尾工作,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数十个民间文学之乡、保护与传承基地,在全球作中国民间文化、文学交流等等,无不以此为起点。

《纳西传奇》只是我一生民间文学,尤其是纳西族民间故事工作的一

个小收获,所收作品不过百余篇,但我仍对它感怀切切、情愫深深。这是因为,它们曾经是我的百科全书、精神宝库、道德教科书。那里有母亲的爱、故乡的心、民族的根性;让我学会怎样做人、安身、立命;令我久久以人民为师,以生活为本,捍卫人民的文化、文学遗产,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文化、文学继承人,从而真正唤醒自己的文学自觉、文化自信,以及作为中华文明后继者的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力。

对我而言,没有任何个性化创作、评论、研究比之更为迫切,没有任何比这些人民文化、文学的传承人更令我礼敬,更没有任何荣誉、权力、金钱、地位比之更能让我守魂如一、奋不顾身。

数十年后温旧梦,让我特别怀念那些我曾亲历的贫穷但充满希望与追求的乡村生活,以及与我朝夕相处、把用生命创造和保存的文学作品传授于我的母亲、堂兄及所有传承人。但愿我的民族、我的故乡、我的祖国永远沐浴在先人所铸成的文学光荣与梦想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华夏

艺文 从谈

##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丁晓平

12年前,因策划编辑军队老作家王宗仁先生的散文作品集《藏地兵书》,我第一次与鲁迅文学奖结缘。作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我应邀参加了在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举行的颁奖典礼。而作为一名写作者,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的心中也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

咱们当兵的人有一句口头禅:“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凭借《红船启航》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当然是一件光荣而开心的事情。鲁迅文学奖,对于一位中国作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确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梦想。今天,我多么幸运,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能够实现梦想,条件、路径和原因很多,但大多不超出三条——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德、才、机遇的一个集合。因此,在这内心喜悦和头脑激动的时刻,我必须十分清晰、清楚和清醒地知道自己、解剖自己,给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找到一个精准的定位。在攀登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一点斗争精神,没有一点自我革命精神,是不可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这让我想起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在的一封信中谈及鲁迅先生:“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直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别人。”是的,对于获奖,我知道,有它的必然性,还有它的偶然性,这就是辩证法。鲁迅先生尚且不断地解剖自己,往往严于别人”,何况吾辈?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2008年,我在《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中写过鲁迅先生。从那时开始,

我决心把1919、1949和1979这三个特殊的年份作为考察中共党史的坐标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新中国创建史、改革开放元年史),并以它们为中心辐射前后30年的中国现代史,立志完成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从觉醒与诞生、崛起与解放到改革与开放的“时代三部曲”,理直气壮地书写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精神史诗。经过20年的耕耘和准备,在完成《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之后,我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历史、学术跨文体写作”道路。因此,与其说我在等着《红船启航》,不如说《红船启航》也在等着我。

说句实在话,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作家,或者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虚构的作家。我认为,对非虚构写作来说,遵守真实性原则是第一要务。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讲故事不是目的,目的是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讲出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历史写作就要写最有价值的历史,写历史中最有价值的历史。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呢?我认为,推动并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发展进步和根本利益的历史,就是最有价值的历史,就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的历史文学写作始终坚持“三三法”,即在文艺创作方向上要把握好“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从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动量和质

量的转换;在创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使得作品拥有敬畏、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创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使作品怀抱全局、情节和细节,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创作重大历史题材作品,作家必须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审慎的叙述中、在对史料去伪求真的过程中,锤炼自己的史识、史才、史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留有余地,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从而在大历史中获取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我曾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为新时代的青年写了一段寄语:“就做一个热爱文学、热爱历史的人吧!眼睛里没有黑暗,嘴巴里没有谎言。面对生活,满怀诗意,披荆斩棘;面对人生,向善向美,所向披靡。人在旅途,成长总不易,你现在的努力,都是正在为你的将来找机会!”当然,这也是写给我自己的,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胡乔木说:“愤怒出诗人,但不出历史学家。”我始终认为,作家应该是思想家,应该拥有理性、浪漫、真诚、善良的美德。我将继续努力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别人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写给人们带来积极影响的东西,写让时间留下来的东西。“搞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红船启航》只是我从事历史写作20年来的优秀作品之一,但我相信,未来更美好更优秀,因为“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名家 名笔

鲁班识字吗?

NO.

鲁班的老师识字吗?

NO.

鲁班的子孙识字吗?

NO.

直到鲁班去世2400多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多数土木匠人仍然不识字。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都有一手精湛的手艺,打造家具、建造楼房、雕刻佛龛。而且,据载,当年故官的建造者,同样如此。那么,他们的经验和智慧,是怎么延传的?耳传口授,心心相印,绵延不断,子子孙孙!

这说明,在文字诞生之前,人类文明早已积累丰厚,就像一颗埋藏于泥土中的种子,最早的生长是根须。直到根须吸收足够营养,积蓄充分能量,芽尖才破土而出。而文化、文明、国家等等,都是芽尖出土之后绽开的叶片、枝干、花朵和果实。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总在默默地健全着适应自身生存、繁衍与繁荣的生命密码。这些密码通过生理记忆,积累起来,变成本能。

从无意识,到潜意识。从有意识,到有规划。对良渚文明的认识,我心之初是怀疑。怀疑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中心论,即东亚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但是,近百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或许,气候湿润的南方地区,更是中华文明早期萌芽的温床,比如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

只是,7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文明之光,如满天星斗,遍地篝火,互不相连。彼时,已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对于石器的利用逐渐精细,出现了最早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建筑业。

生存、生产和生活相对稳定了,物质和精神的贪欲暗暗膨胀。于是,便有了约定,有了层级,有了组织。而此时,在强大的自然面前,面对无法抗拒的遍地猛兽和狂风暴雨,面对神秘莫测的日升月沉和电闪雷鸣,他们愈发认识到了自身的渺小,萌生了本能的敬畏意识。

可是,如何沟通神灵、祈求保佑呢?考古证明,距今大约5100年前,生活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人,在采打石器的过程中,最早发现了玉。

玉者,石之美者。良渚人,似乎领悟到了什么: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物。

于是,玉便成为通灵的神器,便成为最早的礼器。

1936年,考古学家在余杭县良渚镇一带出土了大量玉器。

以后,不断出土各种玉器,特别是璧、琮、玉镯、冠形器、柱形器等。诸多器型,制作精良。

1992年,良渚镇西北约20公里处的莫角

## 良渚之证

李春雷

山遗址,竟然发现大片夯筑基址以及大型柱洞遗迹。

考古学家推测,这是一个中心城址。2005年,该遗址出土的玉器和陶器上,发现一系列原始刻画符号,其中不少刻字方式较为规范。

2007年,莫角山宫殿四周,再次发现一圈环绕的城墙。遗址的发掘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延展到反山、瑶山,江苏省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罗墩,以及上海市青浦区福泉山等处。

观其规模,显然是一个古国。这一切,都在昭示着一个疆域广阔的文明的存在!

去年秋天,我走进了良渚文明遗址。金风衰草,夕阳斜照。细细观察着一处处遗址、一件件文物,心底的问号在一个个拉直。最震撼的是城墙遗址。

原城墙南北长约1800—1900米,东西宽约1500—1700米,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底部宽40—60米,普遍铺垫石块为基。石块呈尖锐状,显然是人工开凿。石基之上,堆筑黄色

黏土,迥异于本地灰黑色淤泥,明显是客土。

城堡、玉器、祭祀……文明的萌芽,悄然

而大,成为后世民族、国家的胚胎。城北部,有一系列人工修建的堤坝。这样,即便有较大降水,对城池也不会构成威胁。更为奇特的是堤坝材料,用草茎包裹泥块,即“草裹泥”。这种技术,正是现代建筑中钢筋混凝土的前身。

在水坝墙体内,我徜徉着当年的水草,禁不住伸出手掌,轻轻贴上去,似与古人握手。刹那间,掌心冰凉、直击神经。浑身犹如电击,浑浑噩噩,眼前一片阴森幽冥,仿佛穿越了5000多年的时光隧道……

忽然,我又生疑惑:良渚文明如此强大、

域内无二,为何只是存在1000多年?

风烟远去,日月无光。

但,仍有一些蛛丝马迹。

查阅历史典籍,最接近者,当是孔子与防风氏。《史记·孔子世家》载: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

其大意为,吴国讨伐越国,攻下会稽,获得一具巨大的骨髀。吴王专门派人询问孔子。孔子说,大禹召集各部落首领在会稽开会,防风氏迟到,被杀,这便是其遗骸。

现在看来,孔子的解释,是错误的。这有所谓“大骨”,应该是恐龙骨或其他大型动物化石。但关于大禹和防风氏的记载,却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防风氏,据多处典籍记载,生活在夏商之前的尧舜禹时代。其所在地,正是良渚文明一带。防风氏,或许就是良渚人,最少也是同类者。

良渚文明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时期。受中原文化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都在发生巨变,一些相对独立的古国已经存在。所以,夏禹在会稽召集各方首领聚会,很有可能。

如果这样,良渚文明在大禹时代,已经沟通中原文明。再往后,便融化于吴越版图,更归属于周天子域内了。

由此,我们可以设想,良渚文明起步较早,进步较慢,后被强势的中原王权兼并。夏商周,以黄河流域为轴心,便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

但是,良渚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确凿无疑。

良渚文明,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